

● 董立章

国 语 译 注 辨 析

国语译注辨析

董立章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广州

粤新登字 13 号

国语译注辨析

董立章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25 字数：63.3万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精装 1000 册 平装 4000 册

ISBN7-81029-137-8/K·8

定价：精装：24.50 元 平装：19.50 元

序 言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指出：“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又在《报任安书》中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前者史称“春秋内传”，后者史称“春秋外传”。前者为左丘明著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后者则是左丘明所据部分史料——列国之《语》的汇编，成书于《左传》之后。从《吴语》、《越语》所记的某些矛盾之处（详见《越语下·功成隐退》文后辨析《历史记述的歧异与史籍、史事的真实性》）可证，左丘明在整理吴、越之《语》时确近失明，或已失明，已无力消除其中人物事件记述的错讹和外误。研究《左传》、《国语》的内容、结构及事件记述的起讫年代，两书确属姊妹之作。

左丘明为鲁国太史，是孔子的知交。《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稍晚于司马迁的汉宣帝博士、今文经春秋公羊学大师严彭祖在其《严氏春秋》中曾引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共相表里。”杨公骥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中对左丘明的历史年代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考察。首先他根据《左传》记事的阶段性详略分析：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150年历史，《左传》用字7.3万；鲁襄公元年（前572年）至鲁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63年，用字7.9万；

1578-206

鲁定公元年（前509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42年，用字2.7万。三者比较，第一阶段记述简略，是因时代距作者较远；第二阶段记述详细，说明所记时代距作者较近；第三阶段理应更详，但却甚略，这一反常说明作者即生活于这一时期。一因现代史所涉及的人和事的资料难以收集。二因所写人物大多健在，直笔详述，风险可惧。其次，杨公骥又从《左传》对日食的记述加以分析：鲁昭公（前541年至前510年在位）之前记有日食5次，传文简明：昭公在位年间记有日食5次，传文记述甚详；昭公之后至哀公（前494年至前467年在位）时期发生日食5次，但《左传》缺而无记。春秋时视日食为列国人事变迁、上天加祸赐福的前兆，——天人感应观念实渊源于战国之前。日食为重大天变，如加记述，必联系列国政界要人。《左传》对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发生的日食缺而不述，恰说明作者正生活于鲁昭公之后的定、哀时期。《左传》记事，以鲁为内、为我，以各诸侯国为外、为他。如《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来”，一字道破了作者的鲁籍。又：鲁君十二公只书“公”，不书谥号；鲁国卿大夫不书“鲁”；称鲁为“我”；鲁事不书“鲁”。《左传》记前468年鲁哀公经公孙有陜氏逃往越国，但对于前467年哀公死于公孙有山氏无记。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陜氏，因孙（通“逊”）於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

《史记·鲁世家》：

“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陜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即陜氏）”。

二者对比，《左传》隐去“三桓攻公”，即哀公为三桓所

逐的史实；按谥法，“恭仁短折曰哀”，《左传》隐去了哀公卒于季氏之党有山氏的史实，仅闪烁其辞地记为“国人施公孙有山氏”，而其因在于有山氏弑杀了哀公，——不然，何以以“哀”为谥？又何因而“施公孙有山氏”？在隐三桓之恶的同时，却敢于指责哀公之过：“公欲以越伐鲁。”继而笔跨4年，以129字之略概述公元前463年赵、智结怨和前453年三家灭智伯之举，以与陈成子关于智氏必亡的预言相应。这不仅证明《左传》止笔于前468年，且证左丘明生活于定、哀时期。当时鲁君形同虚设，政归三桓，因惧鲁祸，故左丘明不敢直笔详记三桓攻公、弑哀公之实而得罪执鲁政的季孙、孟孙、叔孙三家。

关于《左传》作者问题，谨作以下商榷：

其一，左氏、左丘氏孰为左丘明。

钱穆《论语新解》在“左丘明”人物注中说：“鲁人，名明。或说即《左传》作者。惟《左传》称左氏，此乃左邱氏，疑非一人。”

《论语》、《国语》、《左传》对春秋时鲁季孙氏又称“季氏”，对臧孙氏又称“臧氏”。三国时吴韦昭《国语解叙》称：“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史通·六家》唐刘知几称：“马迁撰《史记》。”“史迁”、“马迁”即司马迁。按古人称人物的习俗，无庸置疑，左氏、左丘氏，皆指左丘明。

“春秋五传”为《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夹氏传》、《邹氏传》。公羊即公羊氏，穀梁即穀梁氏。《公羊传》创始人为公羊高，《穀梁传》创始人为穀梁赤。显然，左、夹、邹为姓氏，而“丘明”为名。

其二，《左传》与孔子的思想不尽相同。

《左传·隐公三年》：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

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赵光贤在《左传编撰考》中针对上文“周郑交质”、“周郑交恶”讲道：“按这两句，将周天子与诸侯视同敌国，这与孔子的尊周、称周王为天王的思想是违背的。孔子反对臣召君，书‘天王狩於河阳’，怎么会在里如此尊卑不分呢？左丘明难道连孔子的根本政治信条都不懂吗？”^①

左丘明作《左传》，目的是以信史的记述传释《春秋》，需从历史事件的真实出发，直述其况其情，这样方见《春秋》之义。如也和《春秋》一样，处处曲笔，字字隐晦，以彼种形式之曲、隐，释此种形式之曲、隐，岂不是越传释越糊涂了吗？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帅周、虢、卫、陈、蔡联军伐郑，繻葛一战，郑将“祝聃射王中肩”，周郑交恶时期确势如敌国。对于这一时期的周郑关系，《左传》的上述措辞并无忽误，反映属实。孔子反对臣召君，但作《春秋》是据理行褒贬，对于忤理的肇事者除非从总的方面可予肯定者外，都加口诛笔伐，即如《史记》所说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认为不分皂白，凡天子皆尊之论则是对孔子政治信条的曲解。左丘明认为周桓王、郑庄公关系破裂，咎在天子。在下文以“君子曰”所作的述评中便明确指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这分明指责“王貳于虢”、“周人将畀虢公政”之失信行为。左丘明所贬之天子与孔子所贬性质相同。如非深知孔子的根本信条，则不会有此传神之笔。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晋国史墨对赵简子说：

“天生季氏，以貳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於外，其谁矜之？”

① 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2集。

赵光贤又据此发论：“按春秋之季，‘政在大夫’，季氏专政，昭公被逐，这正是孔子痛心疾首的。史墨的话简直是袒护季氏，攻击昭公。假如《左传》真是左丘明所作，即令史墨真有这话，他也不会写出来。因为这话和孔子的思想太矛盾了。”

对此无须再从理论上驳斥，仅要指出的是：孔子小时曾为季氏委吏（主管仓库之职）和乘田（管理牛羊）且不论，春秋后期鲁君失权，政在三桓，孔子不但收纳孟懿子为学生，且荐冉求、子路等先后为季氏家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称：“季孙好士，终身庄，居处衣服常如朝廷。”“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孔子也曾出任季氏政权的司寇、中都宰，且兼行相事。孔子师徒如此效忠于季氏政权，是否“和孔子的思想太矛盾了”呢？据《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这不是助家臣为乱吗？不深察孔子的思想则对此种种问题茫然。从具体历史环境的实际出发，以灵活的形式，见机而作，服务于奋斗目标追求，方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民重君轻，“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构成之一。

赵光贤又说道：“宣九年记陈灵公杀大夫泄冶事，引孔子的评论说：‘《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按陈灵公在春秋时是有名的荒淫之君，而泄冶则是直言敢谏的忠臣，泄冶以直谏被诛，孔子不同情他，反引诗来加以讥讽，这能说是可信的吗？如果左丘明作书，竟对孔子的思想如此不了解，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了。”

这是既不了解孔子，也不知孔子评论泄冶的真意之谈。

《论语·微子》：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可见孔子处世十分灵活，在政治上见机而作，量势度力而动，既不同于伯夷、叔齐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僵直，也不同于柳下惠、少连的“降志辱身”式的屈从，也非虞仲、夷逸般地“隐居放言”，脱尘遁世。《孟子·公孙丑上》是这样评述孔子的：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万章下》记孔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显然，孔子行事善于审时度势，适应环境，以思想之敏捷、行为之灵活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及时摆脱被动之厄运，更不蹈杀身之陷阱，决不会在对主客观条件尚未深思熟虑之前而仅凭耿耿丹诚或热情冲动去鲁莽蛮干。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沆瀣一气，宣淫于朝，朝政昏乱，直臣缄口。在此形势下泄治独木难支，不可能纠陈国君臣的邪行辟政。孔子引诗责之，是责其不度朝政形势，不思切谏后果，责其痴尽愚忠，自招祸患而无益于事，并非责其忠肝义胆而滥加嘲讽，——是痛心之责，惋惜之恨。赵光贤既不了解孔子，也不明孔子引诗之本意，故轻发《左传》非左丘明所著之论。上述分析说明，与孟子一样如此深刻了解孔子的当时仅左丘明。此文恰是《左传》出自左丘明之手的又一铁证。

经、传思想是否一致不能作为判断是否为传的绝对标准。著

经者与作传者是两个大脑，不可能完全一致。宇宙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相同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如以经、传思想性的完全一致作为判断经、传关系的标准，那么《公羊传》、《穀梁传》更非释经之传。二者各成体系、独自成家的本身便是对为传条件的否定。这岂非怪论。

《国语》属国别史，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语”，二十一卷。除《周语》、《郑语》记有西周少量史料外，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内容。《周语》始于公元前976年穆王伐犬戎，止于前510年晋卿魏献子大陆泽之猎陷火身亡。《鲁语》起于前684年齐鲁长勺之役，终于前484年季康子“以田赋”。《晋语》起于前709年武公伐翼，终于前455年至前453年的晋阳之围及三家灭智氏。《楚语》始自楚庄王，止于前479年白公之难。《郑语》仅记郑桓公迁国之谋。吴、越二《语》仅述会稽之盟及勾践灭吴。《鲁语》继《周语》之后，可知崇周尊鲁；继而是《齐语》，仅记齐桓霸业。因齐桓时期是齐、鲁关系的最好时期，其前、其后鲁长期成为齐国扩张的觊觎目标，后终因鲁依附强晋而免为齐鲸吞。再次为《晋语》，内容最丰，这与《左传》相一致，究其因是晋、鲁关系极密，自晋文称霸至三家分晋，鲁始终是晋的忠实盟国。再次为《郑语》，仅一卷。最后是僭越称王的楚、吴、越之《语》。综观其结构，反映了尊王攘夷、先华夏、后夷狄、详周鲁晋而略齐郑吴的思想倾向。在地理关系上，鲁近齐而远晋；就国际关系论，鲁亲晋而疏齐。因此齐虽近而仅记齐桓在位的齐鲁关系的蜜月时期，晋虽远而详记其霸业兴衰及内部君臣矛盾的发展；而鲁虽弱小却置于齐、晋之前，且有两卷之多。这可证《国语》编辑者非鲁太史左丘明而莫属。

现存《国语》已非左丘明所编原本，既有缺漏，又有后人添补，但原貌尚存，仍是研究先秦史的可信史料。它详记春秋时期的君臣名言和治乱兴亡之鉴，言详事略，因果简明。《周语》反映

王室由盛变衰之因是天子践踏礼制。《鲁语》反映公室的衰颓和季氏强盛的因果史。齐、晋、楚、吴、越诸《语》则反映其霸业的更迭，有的则反映其内部矛盾斗争。《郑语》则是两周之交对天下基本形势的分析和历史的瞻望，堪称春秋史开始的时代背景的综述。

《国语》向与《左传》并称，同是研究先秦史、远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国语》所含内容上自两昊两帝，下至战国之初；广及华夏夷狄、列国百族；尤其不仅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传闻，而且不乏治国治民的经验教训总结。因所记内容距今时代久远，其风俗典制、天文学、地理学、民族学、哲学、军事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难为今人了解，而这些又熔全书于一炉，天衣无缝地综合于古人的思想分析和言谈论辩中，使阅读理解难度不小。因此本书于注译之后，因篇附有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内容的介绍或研究文章，称为“辨析”。详言之，辨析文章有的属于对文篇中某些内容所涉及的有关古代文化知识的阐释和介绍，有的是对人物、事件及政局变迁的简述，有的是对有关历史问题的理论研究。其中有的属于对我国著名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的摘述，而绝大部分为作者已见。尤其应当指出：如无王力的《古代汉语》、杨宽的《古史新探》、高亨的《周易杂论》等书参考，则《国语》一书中的古文化内容则很难深解详述，作者在《国语》的注、译、辨析文章的撰述中得益于三书委实不少。至于文字注释，除主要参考三国时期吴太史韦昭注之外，各种辞典、字典在须臾不可释手之列。为防歧异，凡属辞典、字典释义精确、无需进一步引申者，则一律移录，不再变文另释。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努力从历史的角度作注，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力加详细说明。这样的注释方式及辨析文章紧附于有关文篇之后的结构，突破了仅从文字上勉强释译古籍的当今惯例束缚，对于全书的阅读理解十分必要，并开拓了《国语》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对历史记

述的理解深度。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备要》排印的清代士礼居翻印的宋代明道本（宋仁宗明道二年取天圣印本重刊的《国语》版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的明代翻刻的宋公序补音本（宋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宋庠，字公序，撰有《国语补音》），整理出版了至今最好的《国语》校点本。在这次注译过程中，我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国语》为底本，兼考清宣统三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清代吴曾祺补正本和1985年巴蜀书社影印出版的清董增龄正义本。凡属对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的文字改定处，在注中已明确说明所据。

谨以此书献给我尊敬的老师金景芳教授、陈千钧教授、谢振民教授、钟旭元教授和曹础基教授，感谢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和鼓励、支持。

董立章

1990年9月9日

目 录

(篇名为译注时所拟)

序言

周语上

谏伐犬戎	(3)
【辨析】关于畿服制	(7)
恭王灭密	(10)
厉王拒谏	(11)
【辨析】西周国人	(13)
荣夷公专利	(14)
【辨析】厉王专利	(15)
宣王脱难	(17)
【辨析】彘之乱	(18)
虢文公论籍礼	(18)
【辨析】籍礼之废	(23)
鲁孝公之立	(24)
料民之谏	(25)
【辨析】料民太原	(27)
三川皆震	(28)
【辨析】关于西周灭亡	(29)

惠王复辟	(30)
神、君、兴、亡论	(32)
【辨析】神、君、兴、亡析	(35)
内史论晋惠	(35)
【辨析】内史之论	(41)
晋文必霸	(42)
【辨析】礼崩乐坏始自王室	(45)

周语中

富辰谏襄王	(46)
【辨析】戎狄族姓及周初立法	(50)
文公请隧	(52)
【辨析】王室之衰	(55)
仓葛斥晋文	(56)
【辨析】阳樊之民	(57)
襄王免卫侯	(58)
【辨析】西周有完备的常法	(59)
王孙满观师	(59)
定王论宴飧	(60)
【辨析】飧礼	(64)
陈违故典	(67)
【辨析】西周驿道和宾客接待	(72)
刘康公论贤	(74)
简王冷遇侨如	(76)
邵、单论邵至	(78)
【辨析】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83)

周语下

单子释导鲁成公	(87)
【辨析】吹律听声而判师出吉凶	(91)

单子论晋周	(92)
【辨析】《周易》的占筮理论和占筮方法	(96)
谏壅谷水	(100)
【辨析】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	(109)
叔向论单子	(118)
谏铸大钱	(121)
【辨析】之一：关于景王铸行大钱	(124)
【辨析】之二：《周礼》为姬旦所作	(127)
谏铸“无射”	(129)
伶州鸠论钟律	(136)
【辨析】武王伐纣的年代	(143)
论牺促乱	(144)
城周论咎	(145)
鲁语上	
曹刿问战	(153)
庄公如齐	(154)
【辩论】西周册命	(156)
违礼迎妇	(158)
【辨析】贽见礼	(160)
如齐告彘	(162)
乙喜犒师	(165)
贿免卫侯	(166)
【辨析】关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168)
重馆之宿	(173)
展禽论祀	(175)
【辨析】西周祀典	(180)
益宫受阻	(187)
昭穆之论	(189)

里革矫命·····	(191)
断罟匡君·····	(193)
【辨析】周代的川林管理与生态保护·····	(195)
声伯辞邑·····	(197)
弑君之辩·····	(199)
华国之道·····	(200)
【辨析】三桓兴亡·····	(201)

鲁语下

穆子辩答飨乐·····	(209)
三军致祸·····	(211)
【辨析】西周为政治、经济、文化大国·····	(213)
渡泾伐秦·····	(214)
襄公如楚·····	(215)
【辨析】西周春秋的乡遂制·····	(218)
季冶致禄·····	(220)
虢之会论僭·····	(221)
穆子脱戮归鲁·····	(222)
惠伯赴会·····	(224)
【辨析】夷夏之别、民族融合及国家的形成·····	(226)
坟羊之辨·····	(237)
康子求教·····	(238)
露睹父闹宴·····	(239)
内、外朝之别·····	(240)
【辨析】西周春秋时期的朝寝制·····	(241)
敬姜论劳逸·····	(242)
敬姜循礼·····	(246)
孔子答疑论古·····	(249)
【辨析】我国远古传说性记载的可信和国家	

的形成	(254)
闵马父谈“恭”	(269)
孔子论籍法	(271)
【辨析】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规律	(273)
齐 语	
管仲返齐主政	(279)
选贤举能	(289)
桓公治鄙	(291)
审疆足兵	(294)
桓公定霸	(295)
诸侯归心	(300)
【辨析】略论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历史作用	(303)
晋语一	
栾共子殉君	(315)
伐骊之捷	(316)
晋乱初酿	(323)
【辨析】晋国盛衰及势卿兴亡	(326)
翟租之伐	(341)
优施之谋	(342)
申生灭霍	(344)
兵伐东山	(347)
晋语二	
申生被害	(354)
重耳夷吾出奔	(360)
虞虢之亡	(361)
【辨析】“三虢”之辨	(365)
宰孔邂逅献公	(367)
夷吾谋位	(369)